

近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热播,引起人们关注。《邓小平时代》一书记载了1973年中共十大时,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委员的一些情况,现摘编如下:



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中共“十大”。虽然毛泽东出席主持了大会,却是他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没有亲自讲话的党的代表大会。毛在大会闭幕时无法起身,要等到代表们离开大会堂之后他才离去,以免让人看出他的行动已是多么不便。他仍保留着决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病情,代表们不可能不想到接班问题。按照惯例在大会之后立刻召开的宣布人事任免的一中全会,也因健康不济,毛泽东宣布缺席。从此后,毛不再参加任何中央全会。

时年38岁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脑的主要候选人。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时业已凸显,因为新的中央委员都要由这个机构提名。

他还被委派准备新党章,在大会上作有关新党章的报告,这曾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负责的工作,当时他也是准备接毛泽东党的领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选人。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周之后。其他领导人以及外国的外交官和媒体也开始把他视为毛泽东最可能的接班人。

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无法与王洪文相比。他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但并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十大”的目的是为了在林彪死后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清除林彪余党,因此与正常的党代会相比开得十分匆忙。大会不像1956年的“八大”那样对所讨论的问题做了全面总结,甚至也不如林彪扮演主角的“九大”。与为期24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会期只有5天,王洪文和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个重要报告,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一小时,大大短于中共党代会上通常的报告。这次大会推出了新的领导成员,象征着林彪时代的结束,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纲领。大会集中在三个议题上:批判林彪、林彪倒台后的清查运动和1973年的经济计划。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有将近一半内容是批林的,经济计划没有谈到具体内容,因为当时的经济仍处于一片混乱,领导层也无暇为当

时的五年计划中还剩下的两年——1974和1975年——做出具体部署。

很多老干部复出

“十大”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在邓小平于1973年底掌握了更大权力时,他们将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们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导的“九大”上提拔进来的军队干部。在新的中央委员会191名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经毛泽东同意回来工作的人中有副总理谭震林,他在淮海战役期间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总前委的指挥员之一,曾在1967年2月毅然站出来批评“文革”;这些人中还有王震和邓小平。邓小平过去仅被允许陪同会见外宾,但从7月中旬他开始参与会谈。

毛泽东决定提拔王洪文这个既年轻又无经验的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们很生气。8月21日“十大”前夕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老干部们斗胆提出了反对任命王洪文的意见。许世友将军表达了不太敢说话的老干部们的心声,他说,有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受到压力后他又改口说,可以再加上康生和叶帅。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坚持己见,任命了王洪文。“文革”期间曾在选择要批斗的老干部方面起过阴险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过,另外两个

副主席,周恩来和叶剑英元帅,则是既富有经验又立场温和的领导人。

毛泽东的用意

虽然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却是江青的两个支持者张春桥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们起草的。因此,大会文件虽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权时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倾成果。事实上,“十大”之后的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员,包括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虽然算不上激进,却倾向于左派。毛泽东想用“群众代表”——农民和工人代表——平衡那些回到中央委员会的老干部,尽管他承认“他们的思想水平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众代表去支持主张继续革命的激进派。

邓小平有了新的职务,但并没有为他指派具体工作。不过敏锐的政治观察家看得清楚,毛泽东已开始考虑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们一起出去视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天安门事件”后谁“雪藏”了邓小平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在《实话实说邓小平》中说:1976年的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根据毛远新的汇报,做了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四人帮”可能会去冲击邓小平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内召开,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会上,“四人帮”叫嚣着,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对于“四人帮”说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现在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央工作的,听吧,心不甘情不愿;不听吧,也不行。于是讨论要派一个人去向邓小平进行“查问”。没人愿意去干这一“公差”,江青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了,她说:“让汪东兴去吧。”

自从江青和张春桥在会上说可

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汪东兴就留下了一份心。“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过“群众”抓彭真、斗争彭真。这一次,“四人帮”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要请示主席。

见到毛泽东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向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泽东说:可以。

随后,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且要警卫局参谋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

坚决否认去天安门“指挥”

7日下午3时,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

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一起给父亲送行。父亲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央警卫局又派人来接母亲。我们含着眼泪为母亲收拾行装。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后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江青等人问汪东兴: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

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在东交民巷的禁锢生活

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母亲的眼病复发了。

母亲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母亲住在301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情况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待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有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

母亲住院50天后,眼病基本好转。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据《老年生活报》)